

多變的
孫科

歷史學家高華筆下
的孫中山之子

高華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目錄

論大革命時期的孫科

從反對聯共到支持「西山會議派」……………一三

武漢政府時期的「左派」激進色彩……………一八

從左派陣營又轉到右派陣營……………二六

從擁蔣到反蔣：一九二八—一九三一年的孫科

孫科與《再造旬刊》……………三五

「以黨治國」與孫、蔣合作……………四二

寧粵分裂時期孫科的「黨治」主張……………四六

民主與集權的悖論：孫科與《五五憲草》

呼籲結束黨治，實行民主憲政……………六一

主持起草《五五憲草》	六七
孫科在民主立場上的倒退	七四
孫科與國民政府的對蘇外交（一九三二—一九四五）	
「國民黨內的親蘇派」	八七
三訪莫斯科	九三
退出對蘇外交的舞台	九八
抗戰勝利前後孫科政治態度的轉變	
在抗戰後期的「向左轉」	一一一
孫科與一九四六年政協會議	一二一
孫科與「制憲國大」、「行憲國大」	一三二
風雨飄搖中的孫科內閣	一三七
孫科的憲政理念及其限度	
從「以黨治國」到呼籲民主政治	一四九

主張國民黨向民主政黨轉型……………一五五

解決土地問題的空想……………一六

孫科的困境……………一六六

孫科的晚年歲月

蟄居海外……………一八五

赴台定居……………一八八

重返政壇……………一九一

論大革命時期的孫科

*

孫科是中華民國史上有較大影響的政治人物，以政治態度善變而著稱。他是孫中山先生的唯一兒子，青年時代即在美國加入了同盟會。一九二二年底，孫科被孫中山指定參加國民黨改組籌備工作，從此正式進入國民黨中樞機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孫科歷任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要職，曾兩度擔任行政院院長。自一九三二—一九四八年底，出任立法院長一職，前後長達十六年，是國民黨最高統治集團成員之一。然而，國內史學界對這個民國史上有較大影響的人物，至今尚未充分展開研究。本文欲截取孫科政治生涯中極為重要的一段，探討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孫科政治態度的複雜變化，就大革命時期孫科的政治活動及思想幾經轉變的過程進行考察，以求揭示孫科的政治態度變化的背景、特徵和內在矛盾性，以及這變化與時代潮流的關係。

從反對聯共到支持「西山會議派」

一九一七年夏孫科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後回國，擔任非常國會及外交部秘書，主要從事為革命政府籌款的工作，從而正式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從一九一七年起，孫

科由廖仲愷推薦，連任三屆廣州市市長，對推動廣州市政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自一九二二年下半年起，孫科開始擔任負責職務。一九二二年九月四日，孫科在上海主持召開改組國民黨會議，指定孫科等九人組成國民黨改組案起草委員會。次年十月，孫科被其父派為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參加籌備國民黨改組工作。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孫科在大會上宣佈改組國民黨，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重要發展時期。國共合作的局面的形成，有力地推動了全國革命形勢的高漲，同時，它也成為對原先追隨孫中山先生的一批國民黨人士的嚴峻考驗。作為孫中山的兒子孫科，自然也莫能例外。孫科雖然參加了國民黨一大，並代表臨時中央執委會作了關於黨的章程草案的報告，但卻竭力反對國共兩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方針。在孫科看來，容納共產黨後，國民黨對國民革命的領導，將受到威脅；而排斥共產黨將不影響國民黨實行聯俄和扶助農工政策，孫科對聯共政策的反對態度受到了孫中山的嚴厲批評，孫中山劃掉了原先擬定的中執委名單中孫科的名字，使他在國民黨一大未能當選為中央執委會委員。^①孫科儘管受到其父的批評，但是他並未改變自己的觀點，從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改組至北

伐前夕，孫科反對聯共政策的活動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以孫科為中心，以國民黨廣州市黨部為據點，形成了一個反對國共合作的「太子派」右派集團。孫科在國民黨內資歷、聲望皆不能與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等相比，孫中山在世時，孫科並未能擔任軍政要職。孫科在國民黨內之地位，基本上乃是由於孫之特殊身份而造成。孫中山作為國民黨最高領袖，他唯一的兒子孫科，也無形中受到各方的另眼看待。孫科在國民黨一大後，主持廣州市黨部的工作，由於國民黨當時之勢力，僅及廣州一隅，因此市黨部地位雖低，但在整個黨內卻有著特殊地位。孫科對孫中山的聯共政策，自國共合作建立之日起，就公開表示懷疑。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孫科發言反對國共合作，遭到瞿秋白、毛澤東等人的駁斥。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孫科和黃季陸聯名，攻擊共產黨員違背國民黨黨紀，向國民黨中央黨部提出要求「制裁」共產黨的提案。他還勸告廖仲愷，不要輕信共產黨人。^②由於孫科的特殊身份和他露骨的反共態度，一個以孫科為中心、以國民黨廣州市黨部為據點名叫「南堤俱樂部」的「太子派」在一九二四年開始形成。屬於這個派別的在當時和孫科交往較多的國民黨員有吳鐵城、傅秉常、馬超俊、梁寒操、李文範等，鄒魯、伍朝樞等國民黨元老和孫科的關係也比較密切。

第二，孫科積極支持「西山會議派」的反共活動。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右派勢力開始抬頭，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西山會議派」。孫中山之死，一方面對依賴父親聲望擴展自己勢力的孫科無疑是一沉重打擊；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又使孫科少了一重大限制。孫中山在世，孫科畢竟不能大張旗鼓地和父親的主張對著幹；孫中山病逝，孫科遂可正式實施其反共主張。因此，在一致反共的前提下，孫科和「西山會議派」一拍即合。一九二五年七月，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孫科被選為政府委員，同時擔任國民黨廣州市黨部組織部長、廣東省政府建設廳長等職，但在充滿國共合作氣氛的廣州，孫科顯然不受歡迎。因此，孫科極謀對外發展。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當國民黨右派在北京舉行西山會議時，孫科適在滬，為和「西山會議派」遙相呼應，孫科邀請部分國民黨右派開會商討反共對策，決定聯絡北大「民主主義同志會」等右派組織，以及黃埔軍校及南北各大學右派學生組織「孫文主義學會」。十一月二十五日，「孫文主義學會」上海分會會在滬成立。孫科的積極「反共態度，使他獲得「反共大將」的稱號。^③「西山會議派」對他抱「極大的希望」，不僅在於「西山會議派」看重他是孫中山的「哲嗣」，更因為孫科長期從事為孫中山先生籌款的工作，手上掌握可觀的財源，可向「西山會議派」直

接提供經費支持。事實上，西山會議及「西山會議派」在上海的總部，經費皆由孫科支出。因此，雖然孫科未出席西山會議，但他「實際上是西山會議派中心」。^④孫科作為孫中山先生的兒子，直接捲入「西山會議派」反共活動，無疑給新成立的廣東革命政府帶來不良影響，因此，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竭力爭取孫科。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中國共產黨代表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在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的協助下，在上海蘇聯領事館和孫科、戴季陶、邵元沖會談。陳獨秀向孫等表示中共無意「包辦」國民黨事物，希望他們為了國民革命前途和中共合作。^⑤在陳獨秀的勸說下，孫科表示可考慮回廣州。在此同時，國民黨右派、廣東國民政府代表吳鐵城也專程赴滬，「苦勸」孫科和「西山會議派」脫離關係，立即返穗。吳鐵城向孫科進言：「黨內不可分裂，免為共產黨所乘。對付共產黨乃整個問題，應從長計議。」^⑥在這樣的背景下，孫科與吳鐵城一道返回廣州。儘管孫科返穗在客觀上是對「西山會議派」一個打擊，但是孫科在思想上和「西山會議派」仍保持一致。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一日下午孫科自滬返粵，即到黃埔軍校探訪蔣介石，商量在國民黨「二大庇護「西山會議派」的對策」。^⑦「三三一」事件前夕，孫科和吳鐵城、伍朝樞秘密向蔣介石提議，「將首要共產黨員十數人，送到中山縣附近一個小島或送到

海上去」。^⑧對於孫科的反共活動，當時中央部分領導人就主張予以反擊。一九二六年初，在籌備國民黨二大時，周恩來、陳延年和鮑羅廷就計劃在大會上公開開除孫科的黨籍^⑨，但礙於孫中山的情面，這個計劃最終未能實現。孫科不僅未被開除黨籍，反而在國民黨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執委。因此，在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國民政府時期，孫科在政治上一直被認為是「反動的右派」。^⑩

武漢政府時期的「左派」激進色彩

孫科的政治態度在一九二六年底廣東政府遷移武漢之後發生重大變化。在這個階段，孫科從國共合作的反對派，一躍轉變為三大政策的擁護者，成為武漢國民政府內一個引人注意的國民黨左派重要領導人物。

一九二七年初大革命的形勢是：隨著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勝利進軍，革命運動中心從華南移向長江流域，兩湖地區的工農革命運動空前高漲，反帝鬥爭蓬勃展開，反帝反封建革命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與此同時統一戰線內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進一步尖銳化，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右翼加緊投靠帝國主義，開始從革命陣營分化出來，統一戰線出現了嚴重的危機。在如何對待三大政策的問題上，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的分歧公開化。

然而就在統一戰線已處於嚴重危機、國民黨左右分化進一步加快的一九二七年初，孫科的政治態度發生了向左轉的急劇轉變。孫科的轉變，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孫科在思想上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這種思想傾向對孫科政治態度的轉變具有重大作用。孫科作為孫中山之子，在父親的影響下，較早參加了民主革命活動。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後，孫科雖然反對聯共，但並不反對聯俄和扶助農工，也未脫離革命陣營，而是繼續從事他所負責的工作。在省港大罷工期間，孫科對工人階級反帝運動表示了積極支持。他作為廣東政府代表團團長，前往北京與北洋政府商討對英政策時，發表過措辭強硬的反帝聲明。^①這些活動表明，孫科具有一定的反帝革命思想。另外，大革命的具體政治目標是打倒北洋軍閥，這和孫科的政治思想並無任何衝突，中國共產黨在北伐戰爭中所表現出的巨大作用，是必須正視的事實。所以從反帝和推翻北洋軍閥的政治需要出發，孫科也有可能改變原來的反共態度。

更主要的是，孫科對蔣介石軍事獨裁不滿，要聯合一切力量和蔣鬥爭，這是導致他改變對共產黨態度，決定贊成聯共政策的重要因素。北伐以後，蔣介石的個人獨裁迅速加強，控制的權力也一天天擴大，致使一批國民黨文職官員的地位明顯削弱，對此，孫科深為不滿。面對蔣介石迅速膨脹的軍事獨裁，孫科感到只有和共產黨、國民黨左派合作，並藉助鮑羅廷的影響，才能抗衡；而要獲得共產黨和蘇聯代表的支持，就必須改變原先的反共立場。這不僅成為政治鬥爭的需要，也和當時的革命形勢有關。因為在一九二七年，統一戰線暫時還保持著相對穩定的局面，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力量也迅速發展。在革命力量和反動力量對比上，一時還很難說蔣介石佔優勢。原來孫科有較多聯繫的「西山會議派」，在國民黨二大受到沉重打擊後，此時已不成為一種具有廣泛影響和前途的政治力量。只有受到鮑羅廷支持的以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為核心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才是國民黨黨統的象徵。這種政治格局對於很想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孫科而言，無疑必須加以正視。正是出於政治鬥爭的策略考慮，而不是思想認識上的根本轉變，孫科才在武漢政府初、中期成為聯俄、聯共政策的擁護者。

一九二七年初至五月，孫科在武漢政府內扮演了一個十分活躍的國民黨左派角色，

到處演講，到處發表文章。

孫科猛烈抨擊蔣介石的軍事獨裁，積極參加維護黨權，反對蔣介石遷都南昌的政治鬥爭。一九二七年初，圍繞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問題，在蔣介石和武漢政府之間發生了一場嚴重衝突。這種衝突實質上是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與以蔣介石為首的右派爭奪革命領導權的重大的政治較量。對於這一重大原則問題，孫科的態度十分堅決，他完全支持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定都武漢的決定。一九二七年一月中旬，孫科和鮑羅廷一道，代表武漢黨政聯席會議，把反對定都南昌的決定，當面交給了蔣介石。^⑫不久，孫科又擔任了武漢中央反對獨裁、提高黨權行動委員會五人領導小組成員，和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一道，領導武漢地區的提高黨權運動。在孫科看來，「蔣介石這樣把持著黨，終有一天要做皇帝了」。很顯然，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傾向已嚴重威脅孫科的政治地位，引起孫科的強烈不滿。孫科認識到，只有提高黨權，實行民主，才能對蔣介石進行有力的抗衡。因此孫科把提高黨權看成是關係到國民黨是否變成「軍閥的黨、封建的黨、代表壓迫勢力階級的黨」的一個重大原則問題^⑬。孫科猛烈抨擊「軍隊支配黨，黨變成了軍人的附屬品」的現象，指出「一切武裝同志，都是黨的工具，都要服從黨的決議，接受黨的指

揮」。他強調，必須「完全打破」「從前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那種擁護個人勢力的心理」，「否則革命勢力的勝利，也不過是個人的成功，並不是黨的成功」¹⁴。為此，孫科呼籲恢復國民黨一大所確立的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他針對蔣介石把持國民黨中常會主席，批評《整理黨務案》關於設立中常會主席一職的決定，要求改組中央機構，「變更黨章，把設立主席這一件事矯正，再把常務委員會和政治委員會改組」¹⁵，在黨的民主化基礎上，創立新的黨的權力組織。¹⁶甚至在「四一二」事變後，孫科也到處說「必須打倒蔣介石，只有打倒了蔣介石局勢才能好轉」，表現出了強烈的反蔣姿態。¹⁷

在武漢政府前期，孫科在反對蔣介石獨裁、維護國民黨黨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孫科等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努力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在武漢舉行，會議著重反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行為。由於孫科的反蔣姿態在當時「最為突出」，這使他在二屆三中全會上，加強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擔任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成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和國民黨中央黨部青年部部長、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兼交通部部長。這樣，在汪精衛未返國前，孫科就成了和鄧演達齊名的國民黨左派領袖。

其次，孫科表現出擁護「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的新的政治姿態。三大政策是武漢時期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孫科此時改變了原來反對聯共的觀點，轉而支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他作為一個具有民主主義色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革命高潮來臨之際施出靈活的政策手段，努力去迎合時代的潮流。

孫科對聯俄政策，大加讚美，他稱讚聯俄政策的實施成為「中國革命運動一個很大的轉機」，¹⁸「我們的同志對這個革命的重要政策應該絕對的擁護」。孫科認為，聯俄「實在不特是理所當然，而且也是勢所必要」。因為，「中國國民革命的大敵是帝國資本主義，蘇俄無產階級革命的大敵也同是帝國資本主義，所以中國和蘇俄，應該站在同一戰線上，共同去反對帝國資本主義」。孫科還譴責國民黨右派散佈的「蘇俄是赤色帝國主義」，「聯俄就是要受俄國的支配實行共產」等攻擊。他指出，「這是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派一種最惡毒的謠諑」，聯俄與實行共產，「實在不能混為一談，聯俄就是要達到國民革命的一個重要的策略」。¹⁹

對於聯共政策，孫科也表示擁護。他認為，國共合作是「中國國民革命過程中的必然事實」，國共兩黨「同是革命黨」，又面對「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共同敵人，兩

黨又都要喚起民眾去革命。所以，「中國國民黨為貫徹國民革命的目的，在理論上，在事實上，也當然要和共產黨努力合作」。²⁰對於國民黨右派散佈的「國民黨被共產黨併吞去了，快要消滅了」的流言，孫科認為，這是一個「很錯誤的見解」。他指出，國民黨的前途在於「本黨黨員自己是否能夠革命」，「如果我們的黨，已變成了時代的落伍者，不去革命，不理會被壓迫的群眾，甚至壓迫農工，鄙屑農工，那麼這個黨就是代表封建勢力的黨，是代表軍閥官僚、土豪劣紳、買辦階級的黨，也就是反革命的黨，人家不來亡你，你自己先要亡！」²¹

對於工農民眾運動，孫科也同樣表示支持。孫科稱讚一九二四年後國民黨取得「一個飛躍的進步」，即貫徹了「一個重要的革命策略——農工政策」。²²他指出，「中國的國民革命，實在就是農民革命」。²³因此，「欲使國民革命成功，非使農工一齊起來不可」，而「本黨領導的國民革命……實在就是三萬萬多農民的解放」。²⁴孫科指出，國民黨的農工政策，「是要替全國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去爭回自己應享受的利益，不至給一般不勞而獲的壓迫階級來獨拿」²⁵。他高度讚揚兩湖地區的農民，「在鄉村中從事打倒反革命的土豪劣紳，為國民政府除去心腹之患，並且為將來的民主社會的建設，奠定一個堅固的

基礎」，²⁶「已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放出偉大的光輝」。²⁷孫科質問道：「如果國民黨不扶助這三萬萬多的農民和工人，還說甚麼革命呢？」²⁸他進而認為，「如果國民革命，對於農民問題，沒有徹底的解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對於革命不表同情，不肯參加，這種革命便是落空的革命，虛偽的革命」，「那一定又再重蹈前次辛亥革命的覆轍，縱使軍事上幸得成功，但這種革命仍是沒有意義的，革命一定失敗」。²⁹

孫科熱情地宣傳反帝革命主張，呼籲廢除不平等條約。他說，辛亥革命以來，「國政紊亂，民生痛苦……推原禍本就是當時的黨員民眾，都未認清國際帝國主義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大敵」。³⁰孫科批評當時的革命黨人，對國民革命的對象認識不清，反把推翻清朝視為革命的唯一目標，「以為共和從此告成，革命的事業也從此完結」，致使「從前那種革命的熱情便漸漸消失，以致反革命的勢力天天增長」。³¹他針對國民黨右派懼怕帝國主義干涉的心理，強調指出，「民眾的力量是偉大的……帝國主義者雖然在歷史上有根深蒂固的極大勢力，但拿它和革命的民眾作戰，是到底要失敗的」³²。他還駁斥了帝國主義的報紙，以「中國政治腐敗」為藉口，拒不同意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一種倒因為果的謬論」，「完全是欺人之談」，「中國政治之黑暗，經濟之破產，完全是受

「不平等條約之賜」。他大聲疾呼：「本黨的第一個革命政策，就是反對帝國主義，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民族現在急迫的需要是平等與自由，廢除不平等條約就是中國目前最急要實現的一件事」。³³

孫科的這些言論，反映了他在武漢時期的初、中階段表現出的積極擁護三大政策的國民黨左派的政治姿態。孫科的這種態度，促成了他在武漢政府時期政治上的進步傾向。孫科政治言論的激進色彩，不僅使他贏得了國民黨左派領袖的聲譽，並且還得到中共領導人的好感。陳獨秀就曾稱讚孫科是一個「真正的革命領袖」³⁴。在這種情況下孫科政治上的嚴重弱點，被他激昂的調子給掩蓋住了。孫科成了武漢政府國民黨左派風雲一時的人物。

從左派陣營又轉到右派陣營

一九二七年一月至五月，是孫科政治態度最激進的時期。在這一階段，孫科開口「農工政策」、閉口「反帝革命」。然而時隔不久，隨著國內局勢急轉直下，在國民黨右派

反共逆流的衝擊下，孫科的左傾色彩迅速消退。轉眼間，孫科成為武漢政府內責難農工運動、鼓吹分共的右派代表。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孫科和汪精衛、徐謙等武漢政府「左派」領袖，同時面臨著兩種困局。孫科等既擔憂共產黨領導的日益高漲的工農運動將「危及」國民黨對國民革命的領導，同時又害怕蔣介石的軍事獨裁會威脅他們的權力基礎。在這兩種矛盾中，孫科因為處處維護國民黨領導權，所以和共產黨的矛盾更加突出。

武漢政府後期，在蔣介石與帝國主義勢力的聯合進攻下，武漢地區的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嚴重的經濟危機使武漢政府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而中共黨內以陳獨秀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指導和具體工作中的某些左的傾向又交織在一起，給孫科的反共提供了藉口。孫科把當時的這種嚴重局勢歸咎於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運動，尤其集中指責湖南農運的「不合理的幼稚病」³⁵。他對許克祥發動的「馬日事變」大加讚賞，說對事變「大家都舉手加額，喊許克祥為許青天」³⁶。這時孫科在工農運動方面的調子，已前後判若兩人。他已完全站到了與工農相對立的立場。蔣介石叛變革命造成的形勢逆轉和共產黨的某些具體工作方面的「左」傾錯誤，加速了孫科的動搖，對其一步步滑向反動陣營起

了催化作用。促成孫科向右轉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對三大政策已產生懷疑。他認為三大政策的執行，已威脅到了國民黨政權的存在。孫科一向力主國民革命以國民黨為主體，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應屬於國民黨。孫科出於反蔣政治策略的需要，才一度改變了原先的反共態度，然而即使在他讚頌聯共政策時，也用的是以我為主、居高臨下的口吻。孫科把聯共政策解釋為國民黨的一個「策略」，他聲稱，共產黨只是代表一個階級的黨，而「國民黨是代表全中國被壓迫民眾的黨」。孫科以貌似公正的姿態把破壞國共合作的責任推給「兩個黨中的昏庸分子和幼稚分子」，不分青紅皂白地告誡國共雙方切勿「互相猜忌、互相衝突」。這種騎牆的態度，為他以後公開反共埋下了種子。孫科十分重視國民黨對民眾運動的領導，對中共在工農運動中的影響深懷恐懼，一旦發現民眾運動已不在國民黨控制下，孫科就把民眾運動和共產黨一齊否定了。於是，在反革命逆流襲來之時，孫科立即就從三大政策的擁護者變為反對者。一九二七年五月以後，孫科「至是無日不對共黨下酷烈的批評」³⁷，他攻擊共產黨使「原擬以國民黨為主體而來運用的聯俄容共政策，根本發生了變質」，指責聯俄、聯共政策，「不是聯，也不是容，乃是降……三大政策變成了兩大政策，降俄！降共！」³⁸ 孫科並改變對鮑羅廷的尊崇，轉而罵鮑是「國民黨

裡的共產主義陰謀家」³⁹。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一日，孫科在鄭州會議上攻擊共產黨，鼓吹把共產黨從國民黨中「驅逐」出去。七月初，孫專門著文，「說明國民黨之三大政策之一，為容共而非聯共」，此文影響甚劣，「予時社會以甚深之刺激」。七月十五日，汪精衛召集「分共」會議，汪在會上作了「容共政策之最近經過」的報告，孫科對此報告極力贊成。七月二十日，孫科呼籲和南京政府合流，並作為可被南京方面接受的代表，參加和南京方面的談判。孫科以其反共態度，表明他已徹底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儘管孫科聲稱「不願向右轉」同帝國主義妥協，但是事實上，他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⁴⁰而轉到了右派陣營。

註釋：

* 載《江蘇社會科學》一九九一年第五期。

① 參見何香凝：《回憶孫中山和廖仲愷》，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十七頁；（蘇）納什尼亞科娃·阿基莫娃：《中國大革命見聞》，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一三一頁。

② 參見楊新華：《武漢反共與孫哲生》，載《現代史料》第二集，上海海天出版社一九三三年版，第一八一頁。

- ③ 《黃季陸談孫科》，載《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八輯，台北：一九七八年，第二八四頁。
- ④ 陳公博：《苦笑錄》上，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一六頁。
- ⑤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現代史料編輯社一九八一年版，第六十七頁。
- ⑥ 《吳鐵城回憶錄》，台北：三民書局一九六八年版，第一三一頁。
- ⑦ 《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十四冊，第十七頁。
- ⑧ 《吳鐵城回憶錄》，第一三一頁。
- ⑨ 《周恩來選集》上卷，第一一九頁。
- ⑩ 《陳獨秀一九二六年七月對中共中央第二次擴大會議政治報告》，轉自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下，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三年版，第五二六頁。
- ⑪ 羅香林：《傅秉常與近代中國》，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十四—三十五頁。
- ⑫ 《武漢黨政臨時聯席會議第十三次會議記錄》（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轉引自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三十七頁。
- ⑬ 孫科：《我們為甚麼要有黨》（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載《孫科先生最近之言論》，武漢，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青年部一九二七年五月版，第十一、十三、十四頁。
- ⑭ 《孫科先生最近之言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九—二十頁。
- ⑮ 孫科：《為甚麼要統一黨的領導機關》，載《孫科先生最近之言論》，第十九—二十頁。
- ⑯ 〔日〕山田辰雄：《中國國民黨左派的研究》，東京慶應通信一九八一年版，第一八六頁。
- ⑰ 〔蘇〕A. B. 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一五六頁。

- ⑱ 孫科：《怎樣完成本黨的使命》（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載《孫科先生最近之言論》，第六頁。
- ⑲ 孫科：《聯俄政策》（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載《孫科先生最近之言論》，第三十一—三十三頁。
- ⑳ 孫科：《紀念總理就要革命到底》（一九二七年三月），載《孫科先生最近之言論》，第四十七—四十八頁。
- ㉑ 孫科：《我們為甚麼要有黨》（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載《孫科先生最近之言論》，第十四頁。
- ㉒ 孫科：《革命與農民》（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載《孫科先生最近之言論》，第四十二—四十四頁。
- ㉓ 孫科：《革命與農民》（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載《孫科先生最近之言論》，第四十二—四十四頁。
- ㉔ 孫科：《革命與農民》（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載《孫科先生最近之言論》，第四十二—四十四頁。
- ㉕ 孫科：《革命與農民》（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載《孫科先生最近之言論》，第四十二—四十四頁。
- ㉖ 孫科：《國民革命中之農民運動》，載《孫科先生最近之言論》，第三十九頁。
- ㉗ 孫科：《國民革命中之農民運動》，載《孫科先生最近之言論》，第三十九頁。
- ㉘ 孫科：《農工政策》，載《孫科先生最近之言論》，第二十七頁。
- ㉙ 孫科：《農工政策》，載《孫科先生最近之言論》，第二十七頁。
- ㉚ 孫科：《廢除不平等條約》（一九二七年一月七日），載《孫科先生最近之言論》，第二十一—二十五頁。
- ㉛ 孫科：《廢除不平等條約》（一九二七年一月七日），載《孫科先生最近之言論》，第二十一—二十五頁。
- ㉜ 孫科：《廢除不平等條約》（一九二七年一月七日），載《孫科先生最近之言論》，第二十一—二十五頁。
- ㉝ 孫科：《廢除不平等條約》（一九二七年一月七日），載《孫科先生最近之言論》，第二十一—二十五頁。
- ㉞ 孫科：《廢除不平等條約》（一九二七年一月七日），載《孫科先生最近之言論》，第二十一—二十五頁。
- ㉟ 陳獨秀：《革命與民眾》，載《嚮導》第一八六期，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 ③5 孫科：《革命政府最近兩月的經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轉引自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第二七三頁。
- ③6 《武漢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二十次擴大會議速記錄》（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轉引自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第三四四頁。
- ③7 陳公博：《苦笑錄》上，第一六頁、一三三頁。
- ③8 《武漢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二十次擴大會議速記錄》（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轉引自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第三二一—三二三頁。
- ③9 〔蘇〕亞·伊·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五三三頁。
- ④0 Harold R. Iss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19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